

圣芳济毕业生周斌章见证抗战时期教育不屈奇迹

我的学长从不曾向日军鞠躬

多年以后，耄耋老人周斌章依然记得，战火横扫的年代，圣芳济中学老师上的每一节课都成为了他少年记忆中的“最后一课”。求学期间，他牢记学长挺直腰背拒不向日军鞠躬的故事，守住了一张有尊严的课桌。一卷卷的毕业证书见证了战时教育的不屈奇迹。回忆当年校友“卖掉一卷电线帮自己凑足学费”的慷慨资助，这位勤勉自持的毕业生感恩至今：“学子读书，抚急遽慌乱，承民族文脉。”

青年报记者 卢燕



周斌章老先生展示自己的毕业证书。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10
 青年的抉择

我的求学路

忆父亲开明：“四个孩子都被他送去读书”

阅兵大礼举行前，青年报记者跟随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施扣柱拜访了周老先生位于法华镇路上的家。眉发花白，眼神清亮，岁月并没有给周老先生的脸上留下暗沉，一件年数经久的白色圆领T恤工整地束在灰色布裤里，举手投足，朴素优雅。

带着一份期待，青年报记者诚恳地向周老先生开了口：“能不能看看您当年的毕业证书和学习的课本？”老先生缓缓走进书房，站在书柜前，沉思了好一会。依然还是动作轻缓，老先生打开了柜门，没有四处翻动，手径直伸向了书轴之间一卷用橡皮筋扎好的泛黄卷轴。他面色平静地取出来，翻看卷轴外的一张纸片，上面果然写着一行隽秀小楷：“结婚证、毕业证书”。就在记者兴奋不已的时候，老先生微笑以对：“长远没有拿出来了，要想一会。”

1938年3月，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上任不久即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再次肯定当时政府提出的“战时教育须做平时看”的方针，强调“各级学校之课程……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那一年，年仅9岁的周斌章和家人一起住在虹口区的通州路上。小学二年级的他在父亲的安排下转学到了安福路上的私立树民小学：“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英语。”周老的记忆中，家中光景曾好过几年。周老的父亲在电

力公司任职员，每月近100元的工资可以买上几袋大米供一家六口人填饱肚子。

周老先生在家中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开明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一视同仁。周老先生的妹妹毕业于务本女中，他的两位姐姐也在父亲的启蒙下步入学堂。

“我的堂房爷叔在圣芳济学校做老师，爷叔和我的父亲讲，学校的氛围很不错。”周老先生在学校里第一次见到了鼻梁挺拔的高卢教士：“校长毕业于巴黎高师，是一名传教士，毕业证书上的签名就出自他的手。”

爱听老师讲抗战：“塞班岛战役，日军输了”

公民与社会学，周斌章中学生涯里投入感情最多的一门课。战况不断，莘莘学子无不惦记国家的安危。那个时候，学校最早开在虹口区南浔路上，所有在虹口地界读书的各校学生必须穿过日军岗亭，才能进入校园。岗亭日军跋扈放话：“鞠完躬，再放行。”学长们坚决不肯向日本兵鞠躬。现在想来，周斌章仍对高年级的学长敬意满满。

据周斌章的同学张宏道回忆，1944年的夏天，法国老师破例讲了一节“塞班岛战役”。美、日海军在马里亚纳以西海域激战，日本海军惨败，守岛日军完全陷于孤立。美军攻占岛屿的制高点，随后向北发展进攻。20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只剩3000人。一个月后，日军一个师团的军长自杀。日军残余部队向美军反

扑，遭到全歼。美军占领全岛。

那一课，周斌章和、张宏道和同学们捏紧拳头听得酣畅淋漓：“同学们听到日军输了，那是全班所有人第一次有了集体笑容。”

备受校友关怀：“他卖掉电线为我筹学费”

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一句理想之词看似豪迈，像周斌章这样经济条件中等的读书家庭也不得不面对食不果腹的现实：“1944年以后，父亲的工资渐渐只能换一袋多一点米，我得想办法自己解决学费。”

周斌章并不畏惧忍饥挨饿，但走路上学不能没有鞋穿。他不羡慕班级里家境富裕的同学穿皮鞋，放学下课后，个头瘦小的他默默在静安寺通宵排队，买到一双草鞋，一穿又是很久。

思考良久，周斌章找到了校方提出申请助学金。老师的印象中，这个成绩斐然相貌俊朗的学生几乎将所有精力都专注在了读书与课业里。他的申请让老师心疼不已，当即就为他联系学费的筹助。几天后，周斌章拿着学校开具的一张证明找到了一位40多岁的校友：“他在外滩办公，过去找他的时候，他递给了我一张支票。”

人生漫漫，周老先生已无法再用记忆描绘校友的面容。这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有心人说过的两句话，历经时光过滤，至今仍有暖意。回忆至此，周老先生原本淡雅的脸上泛起红光：“他讲，卖掉一卷电线筹到了一笔钱。坚持读书，回报社会。”

